

国家教育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古代育人的 审美哲学

诸子百家论人才及其教育思想

许华春 /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古代育人的审美哲学

——诸子百家论人才及其教育思想

许华春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育人的审美哲学：诸子百家论人才及其教育思想/许华春著. —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4

ISBN 978 - 7 - 5640 - 5807 - 4

I. ①古… II. ①许… III. ①人才培养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①C96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4546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68914775(总编室) 68944990(批销中心) 68911084(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天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9.625

字 数 / 269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66.00 元

责任印制 / 吴皓云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人的伦理素质和人的修养以及对人的重视，始终是古代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建立自己学说的基本出发点。在国家的运行和社会管理问题上，他们更注重对人的作用的发挥。他们认为社会的贫富，治乱在人而不在天。而且更可贵的是，他们所说的“人”，既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单个的人，而是社会的人。荀子对此曾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即人在力量、行走等方面不如牛马，但牛马却为人所使用，为什么呢？因为人是个群体，而不是个体。可见，荀子是从人类社会的群体性来论证人的作用。同时，古代思想家也看到了正因为“人能群”，群体中的无数个体的人才需要进行管理和协调。所以他们特别强调个体间的合作关系和管理者的组织和协调作用。对一个社会、一个企业来说，最主要的是人，只有以人为中心，发挥人的群体合力，才能兴旺发达。所以，人际关系的协调、群体的和谐、德性的修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对此，儒家提出了“有教无类”和“举贤才”的思想。

孔子很重视教育，他首创私塾，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为了培养出多方面的人才，孔子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同时贯彻“启发式”的循循善诱法则，以“文、行、忠、信”相教。其他古代思想家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在许多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既强调提倡学校教育，又注重家庭教育的展开，从而把教育看成是全社会的行为。教育是育人的基础，也是营造新文明的基础。我国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教育发展的水平。由于我们的教育事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不能完全适应，因此，我们必须加大教育事业建设和改革的力度，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建设者，做好现代化建设的人力资本积累。

中国古代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他们认为进行社会管理的本质就是管人。荀子更是强调国家的管理或其他包括经济管理在内的各种管理，实质上是人的管理和对人管理，贤人和用人是管理的首要条件，离开了人的选用和培养，一切管理，尤其是统治好一个国家将是一句空话。因此，“举贤才”以及“人才”的培养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要想帮助君主建立和巩固天下，就要为其推荐身边的贤能之士。毫无疑问，贤才的标准，古今已有了很大区别，但“举贤才”的方法、举措及尚贤的思想，仍有现代价值，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一些世界性的危机，而人才危机已成为全球的焦点，国际间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我国作为东方古老文明的国度，几经盛衰，如今民族要振兴，国家要富强，靠什么：当然是人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最重要的，最迫切的，是人才。因此，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需要各种人才，只有各尽其用，才能使现代事业顺利开展，才能使中国成为国际竞争舞台上的强者。人才问题历来被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社会事业的改革和推进固然需要很多条件，但人才是其中首要的条件，没有人什么也干不成。所以龚自珍目睹世危时艰的现状，所发出的最透彻、急切的呐喊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以人为本，“举贤才”的思想，有利于民族事业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法制建设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日常经营管理行为的规范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12年于广厦学院

目 录

| | |
|---------------------------------|-----|
| 第一章 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家人才观初探 | 1 |
| 一、孔子“贤才论”的哲学思考 | 1 |
| 二、墨子“智且有慧”的人才观 | 13 |
| 三、孟子“利吾国、利吾家、利吾身”的历史观照 | 19 |
| 四、苻坚重才“不分敌我”的思想和政策 | 31 |
| 五、苏绰“唯在得人”的人才对策 | 35 |
| 六、段灼的多方位人才理论 | 39 |
| 第二章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政策探微 | 43 |
| 一、盛唐重才如宝的社会效应力 | 43 |
| 二、北宋王安石“贤才治国”思想的高瞻远瞩 | 48 |
| 三、古代知识分子政策的有机构成 | 59 |
| 四、汉代中央集权的用人谋略 | 74 |
| 五、古代迫害“儒士”的思想意识 | 80 |
| 六、古代传统的管理思想浅析 | 93 |
| 七、古代管理和用人之道概释 | 102 |
| 第三章 历史人物成才的规律必然性 | 111 |
| 一、历史人物成才概议 | 111 |
| 二、东方朔的人才“命运”说和用人观 | 119 |
| 三、古代丰富的选人、用人的智慧 | 122 |
| 四、古代选人用人制度的变迁 | 126 |
| 五、古代管理名人——曹操 | 130 |

| | |
|----------------------------------|------------|
| 六、古代识人用人的学问 | 137 |
| 七、古代用人的素质理论 | 140 |
| 第四章 古代诸子论育才及其教育心理研究 | 146 |
| 一、孔子育才的教育心理溯源 | 146 |
| 二、孔子育才的教学心理评价 | 156 |
| 三、孔子育才的德育心理思想 | 166 |
| 四、孟子育才的讲学论道探讨 | 181 |
| 五、荀子育才的新颖观点小解 | 193 |
| 六、《学记》是古代人才观和教育理论的专著 | 203 |
| 七、朱熹“拯救人心”的教育心理学 | 212 |
| 第五章 古代组织人事制度与人才结构 | 221 |
| 一、论古代和现代组织人事学的研究对象 | 221 |
| 二、古代人事制度下“清官”的廉政精神 | 237 |
| 三、东汉王符论官吏考核 | 245 |
| 四、海瑞在位时的“清廉为政之道” | 251 |
| 五、古代人事制度的历史沿革 | 263 |
| 六、当代干部人事制度起源于古代 | 273 |
| 第六章 古代教育内容的伦理道德 | 277 |
| 一、“文行忠信”是古代德育的内涵之一 | 277 |
| 二、古代教育观念和素质教育 | 281 |
| 三、从古代小说看中国古代贵族教育 | 284 |
| 四、颜元引领了历史发展潮流 | 290 |
| 五、孔子与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 293 |
| 后记 | 301 |

第一章 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家人才观初探

一、孔子“贤才论”的哲学思考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哲学家，这是孔子的研究者们所见尽同的定论，毋庸再议。除此而外，他是不是还是一位人才学家呢？笔者认为很值得探讨。

当前，大谈人才学的诸公，对于古今中外的其人其事，多有着笔，唯独孔子很少有人注意，即有濡笔者，也是一带而过。殊不知在人才学史上，孔子提出的“贤才论”，较之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要早一百多年。中华民族的“早慧”，又由此而见证。因此，中国孔子的首创之功及其伟大的历史影响，则更毋庸讳言。这从载有他的言论的史料，尤其是在辑述他主要言论的《论语》中，可以窥知其详，尽管它是只言片语的记录，但笔者认为，它往往比之有系统的历史记载更能反映时代的真实。本文试就其中有关孔子的人才观问题，提出自己的浅见。

孔子的人才观与“贤人政治”思想

先秦时代，并没有独立的“人才”概念，孔子的“人才”概念，是泛指春秋及其以前的历史记载中，一些具有政治和文化素养的人物，它包括但并不等于我们现代概念的“人才”。他的人才观，完全是从属于儒学的，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人才”理论。但是，随着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孔子的“人才”观，却横贯于全部封建社

会的历史长河中。这就要求我们在探讨孔子的人才观时，不能抛开儒学的性质和内容。

儒学主要是讲“礼乐”和“仁义”的，而“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以下凡引《论语》的，只注篇名），故又以“仁”为其核心。在《论语》中有一百零九处论“仁”，作为道德标准要求的就有一百零五处。这一百零五处的论述，涉及的问题很多，不过，集中到一点就是“爱人”（《颜渊》）。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这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里，孔子以“仁”为“人”，要求“爱人”，不只是反映了他对人与人之间应该讲平等和博爱的进步思想，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的“仁则众中之贤者也”（《国语·周语》）的远大的政治见解。“仁者爱人”，可以从中发现人才，以“贤”治国，这是孔子的理想，也是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

孔子面对当时急剧变化的现实：“周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大夫专国”（《春秋繁露·王道》），甚至到了“陪臣执国命”（《季氏》）的地步，“君不君，臣不臣”（《颜渊》），“乱臣贼子”，专横跋扈，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状态，经济基础——井田制度日趋瓦解，上层建筑——“礼坏乐崩”，如何挽狂澜于既倒，孔子有过种种考虑，而其深思熟虑的则是“为政”者在用人方面，不应“举枉”，而应“举直”。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所以，应以“急亲贤之为务”（《孟子·尽心》）。历史事实也证明：“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治）臣十人’”（《泰伯》），“同心同德，此周所以兴也”（《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孔子认为，周武王兴灭继绝的复兴大业，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举逸民”（《尧曰》）。“逸民”，据《说文》云：“佚，佚民也，从人失声”；《段注》：“《论语》‘逸民’许作佚民。佚，正字，‘逸，假借字’”；《汉书·律历志》注：“谓有德而隐处者”，由此足证，所谓“逸民”，是散失而隐居的人才，决非“四人帮”所谓的“复辟势力”。孔子从当时的现实出发，认为“举逸民”是实现“贤人政治”的先决条件，是使“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的不二法门。只是苦

于人才难得，而不得不为之感叹，“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泰伯》）。而武王在实际上也只有九个人才，远远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实应多“举贤才”而用之，才有利于他的事业的巩固和发展。所以他说：“昔者尧舜清微其身以听观天下，务来贤人。夫举贤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说苑·政理》）孔子断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这就是孔子“贤人政治”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虽然带有浓厚的英雄史观的色彩，然而，“为政在人”（同上），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例如“五霸，桓公为盛”（《孟子·公孙丑》），达41年之久，孔子认为关键在于“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宪问》）。否则，会使国破家亡，沦为夷狄，“吾其被发左衽矣”（同上）！郑子产，在简公定化年间执政22年，内以礼法馭强宗，外以口舌折强国，不为晋、楚大国所慑服，主要原因还在于他“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孔子认为，子产的这种从己到人，从上到下，全面考虑，万无一失，运筹帷幄的政治外交才能是最重要的。还有，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穆公國小处僻，其霸何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告诉他：主要的因素是“举五穀”（同上）。所以，每当有人向他请教怎样“为政”的时候，他总是强调人才问题。仲弓为季氏宰，向他“问政”，他即告之以“举贤才”，这是孔子“贤人政治”的理论基础（以上均见《子路》）。孔子的这种重视人才，主张提拔贤能的人才“从政”，借以改善政治生活，加强政治建设的伟大思想，其影响所及，不仅在于当时，且为后来者所称颂而津津乐道。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孟子还强调：“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虽大国必畏之矣。”（同上）墨子虽然“非儒”，而在这个问题上，也“称于孔子”，观点极为相似，他说：“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要求任人唯贤，不要任人唯亲。墨子还说：“贤者之治国也，蚤（早）朝晏退，听狱治政。”（以上均见《墨子·尚贤》）这是儒家“君子思不出其位”

（《宪问》）的思想转换和具体化。儒家各派则更赞同“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的首要条件应当是“尊贤”和“尊贤则不惑”（以上均见《礼记·中庸》）的观点。反之，如果“见贤不能举”，或“举而不能先”，那都是玩忽职守，不能容忍的事（以上均见《礼记·大学》）。因此，“为政”必须“尊贤”，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所以墨子的学生有感于此而言曰：“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之道，先王之书，距（远）年之言也。”（《墨子·尚贤》）“贤人政治”的思想，自孔子以来，成了一个历史潮流，“之道”“之书”“之言”，广为流传，为后世争相取法，究其原因，正是孔子自己说的“见贤思齐焉”（《里仁》），“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于国于民，均有裨益。所以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为封建统治者作长远打算的人，对于孔子要“为政”必“举贤才”的思想是无不倾心向往的。因为他的这种思想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可用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扩大封建政治的统治基础，同时又能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制。所以，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孔子理想中的人才

众所周知，任何历史人物的人才观，都是与其相应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的。孔子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愿望，就是要实现他的“贤人政治”的主张，用以挽救“上失其道”“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一方面延缓奴隶制度的灭亡，另一方面使人民群众得到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能够生活下去。这在一定程度上讲，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此，孔子提倡“贤才”必举的思想，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不过，孔子的这个认识和行动，并非孔子所首创，而是古已有之：“尧举舜”“禹举益”“汤举伊尹”“文王举闳夭”（均见《墨子·尚贤》）。因此，只提出“举贤才”还不完全是孔子的独特处，孔子超人的见解还在于所“举”之“才”必须达到“贤”和怎样达到“贤”的标准，以保证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据《说文》

云：“贤，多才也。”《玉篇》：“贤，善行也。”由是观之，所谓“贤才”，就是具有高度的道德修养而又是博学多能的人才。这种人才，正是孔子求之不得的。如果能有这样理想的人才“从政”，就可以使“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了（《季氏》）。

孔子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也正是在这个主要的问题上，显示出他的才智超群，言论出众。有关这方面的阐述，集中地反映在他所理想的人才——“君子”一说之中。《荀子·非十二子》云：“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礼记·哀公问》：“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白虎通·号》解：“或称君子者，道德之称也。”于此可知，不论是扬弃了儒道传统思想的荀况的解说，还是拘守儒家学说的戴圣和班固的注释，都没有超脱孔子的思想范畴。“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公孙丑》）孔子有鉴于当时形势的急剧变化，对为政和不为政的“君子”正是这样要求的：“既有善行而多能，又有德行而成名。”这种要求，多见于《论语》一书，其中言“君子”处，凡一百余次，撮其要者有：“君子怀德”（《里仁》）；“君子以义为上”（《阳货》）；“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里仁》）；还有“君子怀刑”（同上）等。这是孔子认为挽救奴隶社会末世厄运的贤人君子必备而不可少的条件。兹分述于后：

“君子怀德”。“化育万物谓之德”（《管子·心术》），这就是“君子怀德”的主要原因。在孔子看来，仁德是一切道德品质的基础，是所有贤才具备一切优秀作风和优良表现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所以他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特别是以“仁”为内容进行修养而得之于心的“德”，更可以“化育万物”。因此，在子路向他请教如何成为一个“君子”之才的时候，孔子答曰：最重要的是“修己”，只有“修己以敬”，才能“安人”，进而还可以做到连尧舜都不可能做到的事——“安百姓”（以上均见《宪问》）。此真所谓“君子笃恭（德）而天下平”（《诗经》）者是也。为此，孔子便主张“为政以德”（《为政》），要求在位的君子要“道之以德”（同上）。这样就会使广大的人民群众把自觉地遵守社

会的道德规范，看做是光荣的行为，从而在内心里佩服在上者，而自己也就可以进德修业和尊德乐道了。故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德者，本也。”（《礼记·大学》）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前面已经谈到，孔子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是“仁”。对于在位和不在位的“君子”的要求，都是“一视同仁”，但对每个处于不同地位的“君子”，又是因人制宜的。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子张问仁于孔子。子曰：“能行五者（按：即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切。”（《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至夷狄，不可弃也。”（《子路》）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同上）

子贡问曰：“如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上述六贤问仁，孔子根据他们各人的实际情况作了不同的回答。对颜渊、子贡是就如何恢复旧的却是理想的社会制度而言的；对于子张是就如何处人、处世而言的；对于仲弓是就政治生活而言的；对于司马牛则是专指工作态度而言的。但它都是取得“仁”的“验方”，因此，孔子告诉他们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反之，如果“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同上）因此，作为一个贤人君子应该而且必须是“无终食之间违仁”（同上），即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仁。何况“国君为仁，则天下无敌”（《孟子·尽心》）！为政的“君子”更应以“仁”为怀。

“君子以义为上”。“义者，宜也。”（《礼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客观形势在不断变化，天下事，哪个该怎么办，哪个不该怎么办，要“以义为上”（《阳货》），一切以客观存在的事实和要求为转移，遇到困难，不要

有勇无谋，“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同上）。

“君子怀刑”。作为一个君子，就不能见利则趋，目无法度，而且必须是“唯义是从”，唯法为准。

还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子张》）

“君子耻其言过其行。”（《宪问》）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

“君子博学于文。”（《雍也》）

“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

……

以上凡六见，又从思想到行动，从生活到学习各个方面都说明，要成为一个理想的人才——君子，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我国历代兴学校、办教育，其志在于培养君子，目的在于建立君子国。数千年来，举国上下，普遍崇拜者，唯君子是也。故君子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德行超群的标准人物，难怪孔子在当时对君子那么推崇，他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同时深感人才缺乏，人才难得，而又为之望洋兴叹：“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

不过，孔子对他理想中具有各方面才能的君子，提出的“德”“仁”“义”“刑”……的要求，都是建筑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基本上是为维护奴隶制社会生产关系和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对广大的庶民并不现实。虽然如此，他的这种重视人才，对人才提出严格要求的本身说明，奴隶社会统治机构中存在着异常尖锐的矛盾：一方面，存在着专靠传宗接代承袭特权的人，这种人是缺德、少仁、无义，而且又是目无法度、为非作歹的伪君子；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无仕途可寻但确是德才兼备、以仁义为怀、以法律为准绳的真君子。这自然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的一个尖锐问题，但它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无疑是一种障碍。所以，孔子主张“从先进”“举贤才”，实行“贤人政治”，使贤良之才能够得到重用，这对于缺德无

才但身居高位，依仗固有特权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的贵族统治阶级，又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孔子的育才经验及其历史贡献

历代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普遍把人的才能、智慧和道德修养，说成是先天性的，孔子也未摆脱这种影响。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述而》）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评论历史人物的思想，首先应该分清主次，看其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哪些东西。我认为如果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孔子的人才观和他立足于教育培养人才的实践活动出发，就会发现他的人才观的主导方面并不是所谓“天才论”，而是“教育论”，这是比较合乎事实的。

首先，孔子的育才思想和立论是比较正确的和进步的。他这样讲：“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是畏也已！”（《子罕》）孔子既肯定“后生可畏”，今必胜昔，又肯定四十岁左右是人才出名的时期，即今之所谓创造的“豁朗期”，这是符合人才发展规律的。但是否都在这个最佳年龄阶段就自然而然成为“天才”呢？孔子并不以为然。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人之初，禀赋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由于后天的实践条件不一，便各不相同，随之出现了所谓“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的差别；不过，这里的“上次、又次，皆言人资质之殊”（《论语正义》），并不是天生的。所以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尽管别人盛赞他是“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以”（《子罕》）的“天才”，但他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他说，自己之所以“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根本的原因在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同上），而且还想“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里，一个人要成为理想的人才，自始至终不能离开学习。如前所述的“君子”，是

孔子渴望实施“贤人政治”理想的标准人才，这种人才更不是天生的，而是靠后天的教育成才的。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用于教育，精心研究培养这种人才，因而他在中国的人才学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突出的是孔子开设私学的措施和“有教无类”的主张。他广招门徒，培育英才，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仅此一举，打破了“国之贵族学焉”（《周礼》），“学在官府”的狭隘局面，动摇了奴隶主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地位。孔子在当时“道不行”不被重用，这也是原因之一。他办私学，育人才，阻力很大：除贵族统治阶级的高压手段外，还遭到了同行业者的干扰——当时各个学派为了培养自己的阶级所需要的人才，也办了私学和孔子竞争。他们的力量很大：“墨翟之言盈天下”，“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论衡》），致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同上），对孔子很不利。但在孔子“自周反鲁”采取措施，使“弟子稍进焉”的情况下，又用“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颇受业者甚众”（以上均见《史记·孔子世家》）。“故所居堂，弟子内后室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其私学的规模之大，学生之多，教材内容之广，人才之众，以及他本人的威信之高，就远非墨翟、少正卯等人能够与之相比了。

他的学校教育事业，其所以兴旺发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采取了“有教无类”的进步措施：人不管贫富贵贱，地不分东西南北，年不论老少大小，凡是“自行束修以上”（《述而》），办了正式入学手续的，“吾未尝无诲焉”（同上）。这样一来，使“学在四夷”，普及教育，学术平民化，为从更多更广的方面选拔人才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就是说，学生程度不齐，教材不能统一，教学内容和方法应以不同的对象为转移。“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朱熹语），但是，谁是“中才”，谁是“中才”之上或之下，孔子并不凭主观随意判断。他凭借自己“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

孟》)的独特本领,通过个别辅导的方式,在回答学生所问的“仁”“礼”“政”“君子”“士”“大臣”“民”“学”“行”“孝”“文”“禄”“谿”“器”等各种问题的同时,竭力发现和掌握每个人的才能、素质、个性、爱好以及心理活动和生理特点。经过了解,孔子知道,人之性情不同,故所好各异,而且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作为一个人才的培养者,他深深感到在教学方法上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一锅煮”,如“桀也愚,焉得刚”(《公冶长》),冉雍短于口才,“不知其仁,焉用佞”(同上),还有像“柴也愚,参与鲁,师也辟,由也喭”(《先进》),“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同上)等,只能因人而异。再如:同是一个“闻斯行诸”的问题,对于“性鄙好勇”的子路,回答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诸”(《先进》)!而对“性谦”的冉有则答之以“闻斯行之”(同上)。原因就在于“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上)。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使学生自知其长处或短处,以巩固优点,改正缺点,不断进步。

再次是孔子育人,在着重培养学生内在素质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社会和生活影响成才的问题。孔子在着重考虑“因材施教”时,特别注重人才的内在素质的研究,他根据各种人才的志向及其爱好,抓紧一切机会,进行教育。例如发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这些学有专长的贤才时,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方法,进行进一步的启发诱导,以加速他们的成长。一次,“颜渊季路侍”(《公冶长》),孔子就抓紧这个机会,用谈心的方式问学生:“盍各言尔志?”(同上)弟子们各言其志后,“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同上)。孔子便因势利导,告诉他们“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同上)。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杜甫《春夜喜雨》)的教育方法,使学生“潜自有润”,各沾时雨之化,受到了很大的教益。因此,学生们非常感激自己的老师,“颜渊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不。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孔